

# 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

吴建华

**内容提要** 本文对明清苏州、徽州的进士数量重加考订，在两地进士的数量比较中揭示其分布特征和互动关系，从而为进行苏州、徽州两地进士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发展特性比较提供了一个可以把握的基础。

**关键词** 进士 比较 互动 苏州 徽州

苏州、徽州都是明清江南科举人才之乡、文献之邦，素来引起社会和学术的重视。在以科举为重的明清社会，作为科举高级功名层次的进士群体的数量是衡量科举功名状况的一大指标。由于明清中央政府对全国各省分配进士名额，进士数量的省级比较几无价值。但府县进士分布却能反映士子的功名竞争力。进士密集，说明士子竞争力强，科举教育发达，士子和普遍人口的文化素质高；反之亦然。明代苏州、徽州府同属南直隶，清代从康熙始才成为分属江苏、安徽两省的府级行政单位。因此，无论是作为明代的同省，还是清代长期的异省府级单位，苏徽两府的进士情况是可以比较的。

学术界对于苏徽两地进士数量分别已有研究，如范金民对苏州和江南进士，叶显恩、李琳琦对徽州进士，吴宣德对明代进士，吴建华对清代苏徽状元、明清江南进士等。然而对苏徽进士数量、分布使用的统计范围和方法不同，所得指标和特点就有区别；再加上要综合比较两地进士群体数量、分布上的同异较难，因而迄今似无研究先例。本文首先根据今日苏州和俗定的徽州范围，分别统计两地明清进士的数量，然后找出其分布特点，比较其同异，以便深入认识两地进士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发展特性。

## 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特征的总体比较

据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明清苏州、徽州文进士的基本数据、县级地理分布如下：

表 1 明清苏州进士数量和分布表

名称	明进士乡贯	进士户籍		总计
		明	清	
苏州卫	4	4		8
吴县	93	98	203	394
长洲	67	123	146	336
元和			60	60
昆山	61	138	50	249
新阳			9	9
常熟	36	151	105	292
昭文			29	29
吴江	39	85	50	174
震泽			18	18
太仓卫		3		3
太仓州	17	67	68	152
镇洋			25	25
总计	317	669	763	1749
非苏州人	30			30

表 2 明清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表

名称	明进士乡贯	进士户籍		总计
		明	清	
徽州			2	2
歙县	27	139	116	282
休宁	27	37	61	125
黟县	5	6	8	19
绩溪	1	17	14	32
祁门	8	40	7	55
婺源	14	84	38	136
总计	82	323	246	651
非徽州人			清乡贯 1	

以上数据表明：明清苏州进士 1779 名，其中明代 1016 名，占明清苏州总进士数的 57.11%；清代 763 名，占明清苏州总进士数的 42.89%。

明清苏州属县的进士数以长洲(含元和)、吴县、常熟(含昭文)位居前三位，均在 300 名以上，其下依次为昆山(含新阳)，258 名；吴江(含震泽)，192 名；太仓(含镇洋)，177 名。

明清徽州六县进士共 652 名，其中明代 405 名，占明清徽州总进士数的 61.12%；清代 247 名，占明清徽州总进士数的 37.89%。

明清徽州属县的进士数以歙县位居第一，282 名；婺源、休宁分居第二、第三，为第二等级，在 100 多名，不到 150 名；祁门、绩溪再次，为第三等级，60 名以下；黟县最少，仅 19 名。

将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总量和时代、地理分布比较，总体上有以下特征：

第一，明清苏徽两府进士总数相差悬殊。苏州总进士数比徽州总进士数多 1127 名，达 272.85%，即近于 3 倍。而徽州明清总进士数只是同期苏州总进士数的 36.65%，即 113 强。

第二，明代苏徽各自的进士都比清代兴旺。换言之，清代苏徽各自的进士与明代相比都处于弱势。清代(267 年)与明代(276 年)的统治长度相似，进士开科次数由于恩科增加，却有 112%。明代开科严格执行三年一次的做法，只有一次崇祯特科，总共 89 科。但清代苏州进士的数量比重较其明代少 14.22%，清代徽州进士的数量比重较其明代少 23.23%。而且，清代徽州进士的衰退程度甚于苏州，比苏州增加 9.01%。

无疑，表面观，苏徽各自的进士数量和比重，明代超过清代。但是，清代徽州进士与苏州相比，确实衰退得如此厉害吗？不是！清代进士考试时乡贯和户籍的申报制度变化了：只填报现户籍所在地，是单一的现籍申报制度，从而让人忘记其乡贯。而知情者才知道中式进士的乡贯，并在地方会馆、方志中仍然记载。如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开列本县所有本籍、寄籍的金榜题名者名单。

明代则与清代不同，乡贯和户籍有区别。乡贯指个人出生地、原籍、世代居住的祖籍，相当于原户口所在地。户籍指“现”籍，“现”户口所在地。明代大多数人乡贯和户籍合一。少数人因从军、仕宦、经商等缘故，政府允许他们在外省府县应考，从而出现乡贯和户籍的双重记录。应该说，这是比较科学和实际的登记做法：既免除应考士子长途奔波回乡应试之苦，又明确标

记中式士子的老家和新户籍。

第三，进士的县级单位分布上，苏州属县的进士数远高于徽州属县的进士数，而且差距极大。位居苏州进士数前茅的长洲、吴县的进士都接近 400 名，而绝对位居徽州进士数榜首的歙县，进士不足 300 名。苏州进士最少的吴江县，进士也有 177 名，而徽州进士最少的黔县，进士仅有 19 名。这一现象说明，所谓的进士人才极盛，包含的数量概念在不同地区会大不相同。徽州和苏州的县级之间进士数差距很大，所以，除了要观察进士数量，还要将进士数与该地的人口数、进士的流动、进士统计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判断该地进士科举是否兴旺发达。本文的侧重是：以苏徽进士的数量，还有进士的籍贯和流动，以及进士的统计方法，从而窥视两地进士的分布和互动特色。

### 明清苏州进士的具体数量、分布特征以及与徽州进士的比较

从明代苏州进士的乡贯和户籍看，从洪武起开科取士，士子填报的或乡贯，或户籍，都是单一籍贯。长洲人陈蕴以辽东盖州卫军籍登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 年）一甲二名进士，开始了乡贯和户籍并列申报和登录。但是，这期间以军籍、匠籍为主，控制严格。直到万历时期，民籍才渐渐多起来，显示政府进一步放宽人口的流动空间，放宽科举的户籍限制，造成社会人身控制的松弛，因而对教育科举、人才的多方面崛起十分有利。苏州明代进士有 301 人具有乡贯和户籍的双重记录，表明他们就是通过这一离开家乡、入籍他乡的途径获得了科举的成功。

明代苏州进士，包括崇祯特科进士 4 人，共 1016 人。其中，669 人只有户籍记录，有乡贯记录者 347 人。在 347 名有乡贯记录的进士里，乡贯和户籍都注明者 301 人，46 人仅注明乡贯。

只注明苏州乡贯的 46 名进士应是苏州人。洪武朝 4 人，建文朝 1，永乐朝 35，宣德朝 2，嘉靖朝 3，崇祯朝 1。以明代前期为多。

乡贯与户籍有所不同、并行登录的 301 名明代苏州进士都发生过居住地迁移。其中 271 名是苏州人，30 名是非苏州人迁入苏州籍的。

271 名明代苏州进士有两种迁移情况：一种是苏州人迁到苏州府内其它县分的，有 93 人；另一种是苏州人迁到苏州府外的，共 178 人，是进士迁移的大头。

以上明代苏州进士，只拥有苏州乡贯的 46 名，只拥有苏州户籍的 669 名，同时拥有乡贯和户籍的 271 名，共 986 名，都堪称老苏州人。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有的一直在本地，用苏州户籍或乡贯（669 名加 46 名，共 715 名）；有的外迁苏州府内其它地方（93 名），有的离开苏州（178 名），使用人居地的新户籍。

只知户籍记录的苏州明代进士 669 人，其中民籍 514，为 76.83%，军籍 82，匠籍 53，官籍 15，儒籍 2，医籍 2，旗籍 1，以民籍为最多，其次为军籍、匠籍、官籍。

1016 名明代苏州进士依其籍贯，可分三类：第一类，乡贯和户籍都在苏州，是地道的苏州人，共 715 人，占明代苏州总进士数的 70.37%。

第二类，乡贯在苏州，户籍迁在府内其它县的 93 人，或迁在府外的 178 人，他们是老家在苏州，身处外乡的老苏州人，共 271 人，是明代苏州总进；士数 1016 人的 26.67%，更是乡贯和户籍都标明）的 301 人的 90%。

苏州人出外人籍参加科举考试，成为进士，主要有在府内异县和府外诸地的。

以户籍论，在苏州府内迁移的93人有官籍3人，民籍68，军籍12，匠籍5，户籍不详5。有的是一家迁居人籍，科举中式进士的。如昆山王世贞家族迁居太仓州成军籍，顾济家族迁居太仓成民籍，吴江李氏迁居长洲成民籍。而吴县换成长洲籍，长洲换成吴县籍，在科举竞争上没有户籍的便利可沾。

明代苏州有178名府外籍进士，系迁移府外人籍中式的，占明代苏州进士的17.52%。他们外迁人籍之地如下：四夷馆1人，太医院5，锦衣卫19，留守前卫、后卫各1，武功中卫8，武功左卫4，大宁都司2，中都留守司1，辽东2，北直隶5，顺天21，河南5，山东7，陕西4，湖广5，广东1，云南7，四川4，贵州3，浙江21，南京9，应天府28，南直隶14。可见分布很广。当然，北京、南京两都中央机构多，用人多，机会多，利于发展，自是吸引苏州人才的头等地方。明代苏州进士出自北京太医院籍的有5人，锦衣卫籍多达19人；南京锦衣卫籍有4名。顺天地在京师，便于苏州人才在京应试，故明代苏州有21名进士寄籍于此。特别以顺天府附郭的两县为多：大兴14人，宛平4人。应天府附郭两县籍的苏州进士也不少，江宁10人，上元18人。同时，浙江以及南直隶除苏州以外的地方，都是明代苏州人才迁移中式进士的好去向。如苏州进士有浙江嘉兴府籍14人，湖州府籍5人，杭州府籍2人。至于内地如湖广、河南，边远地区如辽东、海南，贵州、云南、四川、陕西，出于多种原因，苏州人迁去了，不时会有他们或者其后裔高中进士的喜讯。

178名苏州府外籍进士以民籍为最多，达49人。军籍46人，与民籍几乎同等。匠籍也多，40人，说明依靠技艺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苏州人外迁入籍中进士的渠道。其他户籍的17名进士，以军匠医站厨等有技能的户籍占多数。而不详户籍者有16人，实际上也会以军匠等籍为多数。官籍才10人，毕竟是少数人口才能得着的。

这178名进士的来源是：苏州卫4人，吴县52，长洲35，常熟13，昆山38，吴江33，太仓州3。吴县、长洲、昆山、吴江四县人员最多。

这一明代苏州人口和人才外迁的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与徽州进士在本地外面的人数较多相对照，苏州竟然有此同样的社会和人口人才分布现象。只是徽州地域的整体性强，只要是徽州出来的进士，无论在本地、外地，无论是乡贯、户籍，无论本人生长在徽州，还是祖先源于徽州，都被当作徽州的进士，叫得很响亮，而苏州因为本乡本地的进士人才累积已很雄厚，游落在外的苏州人中了进士似乎大大不如徽州那么得到原乡的关注。

苏州、徽州人口在异乡人籍取得进士，一方面展示出自身强劲的进士科举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占用人籍当地的科举名额，不过，这里有互动互补。一般说，异乡人人籍苏徽占用苏徽进士名额，苏徽人也占用了人籍异乡的进士科举名额。

第三类，乡贯在外省府县、户籍在苏州的，是从外乡人居苏州的，可称为新苏州人。明代苏州进士有30人属于这一类型，占明代苏州总进士数的3%，比例极小。也只是乡贯和户籍并录进士数的1/10，说明苏州的移民进士数量和比重大大不如土著人口中的进士。

这30位迁人苏州的移民进士的来源地区是：常州1人，武进1，无锡6，江阴2，嘉定1，仪征1，歙县1，休宁2，浙江黄岩、秀水各1，直隶无为州2，河南汝宁1，湖广衡山2，其中有日后苏州画才世家的文征明文氏家族，湖广江陵1，江西4，包括来自清江的彭防，以后是苏州书香阀阅，峡江1，新淦2，山西阳城1，顺天霸州1，武功左卫1。以常州府（10人）、徽州府（3人）、秀水及嘉定等苏州邻近府县来迁人口为较多，占来迁人籍得中进士30人的半数。

这30名苏州移民进士以民籍13人居多，军籍9人居次，官籍5人，户籍不详3人。没有见到匠籍出身的，与苏州178名府外籍进士中匠籍占第三位的情况有所不同。

入迁太仓成进士的是无为州的2名江姓，都因官籍来迁。而文林人长洲官籍、文森人长洲民籍，均在成化年间，都从湖广衡山来迁。尤应注意，这些进士中有3名来自徽州，寄籍苏州：休宁查应兆以长洲官籍中正德十六年二甲79名，休宁汪邦柱以长洲民籍中万历四十七年三甲202名，歙县王天爵以吴县民籍中嘉靖三十八年三甲40名。苏州在明代成为徽州人人迁之地，意味苏徽之间存在人口、人才的流动和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两名徽人迁人当时苏州府嘉定县，即歙县李先芳、李名芳，都以嘉定民籍分别中式万历十七年三甲141名和万历二十年三甲218名进士，一并开列，以便见到更多的徽人寄籍苏州，说明这是徽人选择外迁的一种现象。

清代进士题名碑录只填报户籍，以应考所在地为准，如昆山“东海三徐”徐乾学兄弟子侄都是长洲籍，而众所周知他们是昆山人，是在苏州城以长洲户籍读书应试中式的。所以所有方志上，他们当然归位老家昆山。清代科举时乡贯和户籍分离，从而引起进士统计的混乱。一些不很出名、事迹记载又少的进士，籍贯易被弄错，于是影响到各地进士人数的统计。

据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清代苏州进士763名，填报的都是户口所在的“现”籍。至于他们的具体乡贯，政府不大关心，只有履历表、乡会试录才详细刊刻，供天下所知，成为血缘和地缘的联系图谱。另外，家族谱、方志也有些记载。

### 明清徽州进士的具体数量、分布特征以及与苏州进士的比较

明代徽州进士405名，有乡贯记录者85名，其中徽州乡贯82名；非徽州乡贯3名，是外地人迁徽州的新徽州人。

明代徽州进士405名，有户籍记载者390名，没有户籍只有乡贯的巧名。

有户籍记载的390名进士里，徽州户籍3加名（除去外乡人迁的3名），他们与仅有徽州乡贯的巧名，共335名，都堪称老徽州人，占明代徽州总进士数405名的82.72%。而390名有户籍记载的进士中，非徽州户籍者67名，占明代徽州总进士数的16.54%，是徽人外迁人籍的，也是老徽州人。

320名徽州籍进士的户籍是：民籍273人，军籍38，匠籍7，官籍1，生员籍1。显然，85.31%的进士出于民籍，超过苏州的比重。但其余户籍的比重均不如苏州大。尤其匠籍很少，表明明代徽州技艺百工户口少。因为商人多，只是民籍户口。

明代标明乡贯和户籍的徽州进士共70名。其中，乡贯是徽州的67名，乡贯不是徽州的移民进士3名，仅占明代徽州总进士数的0.74%，远小于苏州移民进士的比例。

乡贯是徽州的67名进士分布在休宁24人，歙县23，婺源11，祁门7，绩溪1，黔县1。他们都迁居人籍徽州府外之乡，应试中进士。显然，徽州又以休宁、歙县的子弟外迁考中进士居多。但徽州不同于苏州，几乎没有本府内迁移中式进士，反映明代徽人府内地域居住的稳定性强。

明代徽州进士出现乡贯和户籍并行登记是在景泰五年（1454），从休宁人程景云开始。他以陕西宁夏卫军籍考中二甲三名进士。比苏州1448年首个类似的寄籍进士出现要晚6年，说明苏州人在充分运用科举政策上领先徽人一步。而徽人不甘落后，运用放宽的科举户籍政策，也在异地取得进士功名。

更有甚者，徽州人根据在外经商子弟众多的特点，在天启年间由徽州士子吴宪、汪文演提出，得到时任巡视浙江盐政的徽人叶永盛的眷念，“请许商人占籍，或亦维桑之私意乎？”。叶永盛进一步向明廷政府建议，终于取得在杭州专设徽人科举商籍的特惠，既保证了徽商子弟人学应试的名额，又在地利上极大地方便他们应试。

因为明代苏州与徽州统属南直隶，徽人没有理由回避回家报名应试。因此，明代后期，在苏州的徽商子弟同在扬州的一样，虽然没有享受“商籍”应试的特惠，但是，他们经商的社会地位由此得到了提升。

上述明代徽州 67 名府外籍进士占明代徽州总进士数的 16.54%，还不如同期苏州府外籍进士在本地进士的比重大（17.52%）。可是，因为徽州本土进士的总人数少，徽人府外籍进士便是其进士阵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同样受到徽州原乡的重视，而且这一重视程度是苏州府外籍进士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尽管明代徽苏两地同有府外籍进士现象，甚至在数量和比重上苏州比徽州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地理背景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大，这一社会文化和人才现象的重视程度在两地就发生巨大差别。苏州主要依靠本地的进士赢得科举人才之乡的盛名，而徽州的科举人才声望总挂着外迁的徽人进士。这一点在清代发展到极点，也是徽州进士等科举人才分布的显著特点，与苏州进士等科举人才分布差别最大的地方。

明代徽州 67 名府外籍进士的地域是：南直隶苏州府 5 人，应天府 11，扬州府 4，松江府 1，安庆府 11，太平府 1，池州府 1，和州 1，庐州府 1，浙江 12，福建福州府 2，锦衣卫 1，北直隶 2，山东 2，河南 6，湖广 4，陕西 1，贵州 1。

徽人迁居靠近徽州的南直隶的府县而中式进士的人数较多，达 36 人，浙江有 12 人，尤以杭州的 9 人为多。同苏州府外籍进士一样，徽州府外籍进士也喜欢应天南都，人籍江宁的较多，但不像苏州府外籍进士，他们在顺天京师的人数不多，在杭州钱塘的却很多，充分显示徽州外迁人口和科举人才分布与原业商业相关的特色。

特别注意，明代徽州府外籍进士 67 人中，有 35 名都人籍在省府直隶州附郭县，说明他们用主动迁居优良环境来改变原生活环境，取得了科举成功。

明代徽州府外籍进士 67 名的户籍以民籍 45 人为最多，军籍 6 人，官籍 3 人，匠籍仅 1 人，户籍不详 12 人。也就是说，依照明政府法定的官、军、匠籍等特定的户籍，徽人能实现地域空间移动的毕竟是少数人，而民籍人口（包括商人）移动占了大头，这正反映明代中后期社会控制松动，人口流动频繁的新现象，科举士子可以在人籍地以民籍应试了。

明代乡贯是徽州之外的地方，以徽州户籍中式进士的只有 3 人，都是歙县籍，就在府城，学习应考比较方便。并且一个是浙江仁和的汪彦冲，歙县民籍，隆庆五年三甲 91 名进士；另二人是徽州附近府县的：洪维翰，直隶泾县人；程言，直隶太平人，都以歙县民籍中式崇祯十六年三甲进士。可见，明代迁人徽州、用徽州户籍中进士的士子极少，不像苏州地方吸引天下士子来迁的魅力大，因而移民进士众多，进士群体开放性大。

徽州人出外贸易应试，转徙他乡，定居入籍，外迁厉害，于是出现一种徽州社会文化上特别突出并受重视的现象——寄籍。正如上文所述，这是苏州社会文化上同样存在但远未受到重视的现象。晚清徽州学者许承尧在评价歙县方志时指出：“其本为歌人而他徙或寄籍者，志皆遗之，然《敦志》于时代较近之人亦时录及寄籍，而明以上独缺，是为自乱其例矣。”其实，徽州有的地方志体例的混乱恰恰映射本地社会文化的特殊性。

清代进士题名碑录上的徽州进士 247 名，只是本籍进士。而徽州方志中的本籍和寄籍进士数量，的确尽编纂作者所能，记录了不少。如前所揭，李琳琦已做了详细统计，结果徽州清代进士数量远远高出根据进士题名碑录记载的统计。像清代苏州潘氏家族出了 8 名进士，除乾隆三十四年潘奕隽破天荒以浙江钱塘籍中进士，随后人籍吴县，其后的进士户籍在科举题名录上，在苏州方志上，在潘氏自述的户籍上，都是苏州吴县，是苏州城里显赫的“贵潘”支族。然而，在徽州方志里，在北京敦县会馆里，在潘家的日常生活和心底骨子里，总铭刻他们是徽州人。歙县大阜潘氏宗祠总以他们为荣耀，声气时时相通。

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上的科举题名榜，歙县本籍、寄籍的京官、科名都赫赫在列。据此名单统计揭示：清代歙县人以寄籍获中进士者共 165 人，其中寄籍在苏州各县的有 23 人，占寄籍进士总数的 13.94%。苏州不愧是徽州子弟寄籍他乡，科考进士成功的好去处！徽人子弟以苏州籍中进士，在满足自身政治社会文化地位提高的同时，也对苏州科举文化发展贡献才智，起了

重大影响。在苏州历史上，徽州俊秀留下了倩影，占据了地位。这就是徽州人口流动造成的苏徽文化科举的良性互动。

作为明清中国科举的（文）状元之乡，明代中后期苏州状元已显雄势，清代苏州状元则臻于鼎盛态势。清代苏州府状元 24 名、太仓州 5 名，共 29 名。不计属今上海市嘉定区的状元 3 名，属今苏州大市的状元有 26 名，占清代总状元数 114 名的 22.81%。但是，其中就有先世或自己迁自徽州的 7 名状元。他们是人籍昆山的徐元文，常熟的 160 汪绎、汪应铨，镇洋的毕玩，吴县的潘世恩、吴信中、洪钧。还有定居苏城名园狮子林的休宁状元黄轩。

从安徽徽州迁出的士人定居江苏苏州之后，得中状元的人数比迁居其它省府的多得多。笔者在 1989 年发现，清代徽州本土状元 4 人：歙县金榜、洪莹，休宁黄轩、吴锡龄，都是徽州乡贯和户籍合一的。而源出徽州、人籍他乡的士子高中状元的倒有 13 人，其中江苏 7 人：苏州 6 人（见上列名单），金山 1 人戴有棋；浙江 3 人：仁和金德瑛，秀水汪如洋，归安王以銜；江西 2 人：大庚戴衙亨，彭泽汪鸣相；安徽天长戴兰芬。最近得知江苏江宁状元黄思永也是徽州人。这样看，徽州士子寄籍在外，得风气之先，用功攻读，不负众望，蟾宫折桂，独占鳌头的几率比在闭塞的本土山区高得多。寄籍或久迁他乡的徽州士子考中状元、进士的人数多，成为徽州科举人才的一大特色。尤其在苏州颇有起色，得到与苏州地域互动交流的巨大优势。他们敢于同苏州或江南士子挑战棘闱，平等竞争巍科高名，说明他们达到或超过了许多同侍。

苏州不少士子也有同徽州士子一样的做法，寄籍在外，特别是寄籍顺天府大兴、宛平等京师附近县分。因为他们文化素质高，又避开江南或苏州科场激烈竞争，容易取得科举功名。但根据规定，江南人在顺天北闱的举人名次会受影响，最好成绩也只能拿第二名，所以顺天乡试“亚元”含金量很高，在人们心目中相当于南人在北闱的解元，凡是文献都要特别注明。

与徽州进士的户籍改变差别很大的是，苏州进士在本府内的迁移人籍也很多（如明代 93 人府内迁居，178 人府外迁居），徽州进士在本府外人籍的人数很多（如明代府内迁居未见，府外迁居 67 人）。这批进士的数量，明代的还能在题名碑录上考究出来，清代的因为登录籍贯的要求不同，尽管有些其它记载可以统计，还是难以胜数了。

## 结语

以上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数量和分布特征的比较表明：

首先，应该承认，尽管明清苏州、徽州两府的进士绝对数量悬殊，它们都是当时中国和江南科举发达的地区，进士人才辈出。但即使在同府，各县的进士和科举人才会因环境和人口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不平衡发展，此点在徽州各县表现尤其明显。

其次，明清进士的籍贯登录制度不同，影响了对苏州、徽州进士数量的全面统计和分布特色的掌握。

从科举考试登录的进士的籍贯上讲，经过我们以上详细的统计分析，得知：明清苏州、徽州进士都各以乡贯和户籍在本地的进士为这一群体的大头，且以民籍为主；同时，都有乡贯在本地、户籍在外地的寄籍进士，也都以民籍为主；但苏州有府内迁居和府外迁居的进士，徽州只有府外迁居的进士。此点在明代两地的进士统计中尤其清楚，在清代，因科举户籍登录的关系，全部的进士统计比较困难。

徽州对寄籍进士（如明代府外籍进士占 16.54%）的重视远胜于苏州，从而使人们几乎忘记了苏州也有寄籍进士（如明代府外籍进士占 17.52%）的社会文化现象。造成此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根源还在于处在皖南万山丛岭的徽州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社会结构，以天下为经商战场的职业与经济结构。徽州人口迁出多，迁人少，人口流动性强，开放性不一定强；而苏州处于江南太湖平原地带，人口的迁进和迁出都比徽州频繁，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都强，对外迁人口内考中的进士人才相对来说就没有徽州那么重视了。

第三，也是最具特色的，明清苏州、徽州在科举功名上的地域互动十分明显。进士人才之间的互动是其中的一个侧影。

尽管徽州较少移民中式进士，这点不同于苏州，却有不少徽人或徽裔迁居苏州后中进士，居巍甲，声扬天下，光耀苏州人籍地和徽州原乡，展开了两地科举进士的互动。

这种互动之所以能够展开，一方面是身处崇山峻岭中的徽州人自身主动谋求发展的需要。苏州以其“人间天堂”的形象成为吸引徽人打破闭塞、寻求发展的一个理想场所。在苏州，他们迁移入籍后，追求到了在徽州不易得到的文化科举、社会地位、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成功和满足，或者说补充了徽州封闭地域里的缺陷。另方面对苏州来说，保持人口的适度流动，尤其是增大吸引人才的力度，不仅利于长远的发展目标，保持社会经济文化的长盛不衰，而且能以大开放姿态，招致新人才智慧的不断注入，这是苏州长享“人间天堂”美誉的成功法宝。部分徽人的聪明才智在苏州得到有效发挥，自身也融入苏州社会文化之中。他们的创造贡献，从乡贯根性上讲，无疑是徽州的，从“现”籍“现实”上讲，又是苏州的，两者并行不悖。因此，苏州、徽州在进士等人才的互动上取得了双赢效果，有力促动了苏徽两地社会文化经济的变迁，也给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责任编辑：潘青